

“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

——莫尔顿《文学的近代研究》与郑振铎的中国文学研究

王 波

内容提要 郑振铎提倡以输入的新方法、新观念、新途径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莫尔顿《文学的近代研究》是其重要理论资源之一。此书倡导的“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的三个方面，即文学的统一观、归纳的观察、进化的观念，对其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具体表现在关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及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拿证据来”的文学实证研究、以文体和“故事”两个视角考察中国文学之演变。郑振铎对中国文学研究现代转型有重要贡献，但在不自觉地构建文学研究“科学主义”背后，轻视了传统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研究中审美、情感等非实证因素的价值。

关键词 《文学的近代研究》；郑振铎；文学的统一观；文学实证研究；文学进化论

“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①，在这一进程之中，郑振铎是极其重要的一位。他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等文中多次提倡以输入的新方法、新观念、新途径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并将之付诸到自身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其中，莫尔顿^②《文学的近代研究》是其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他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中指出，整理中国文学，必须有“打破一切传袭的文学观念的勇气”与“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后者即莫尔顿在《文学的近代研究》中所述及的“文学统一的观察”、“归纳的研究”与“文学进化的观念”^③。

郑振铎与莫尔顿《文学的近代研究》之间的学术关联，因他在文章中有所提及，研究者已有相关认识^④，但大多数是简单叙述，鲜有深入探讨。这一现代学术史上的“输入学理”^⑤并未得到重视，甚至还存在一些事实的谬误，比如《郑振铎全集》第16卷收录的郑振铎致孙祖基的信中提到 Moulton，整理者竟然把 Moulton 注为“莫尔顿(1835—1908)，美国女诗人，作家”^⑥，真是谬之千里。陈福康先生多次提及，莫尔顿此书对郑振

铎影响很大，而且对现代中国很多作家和学者也有影响，并认为“这本身就是‘影响研究’值得注意的课题”^⑦。本文梳理莫尔顿《文学的近代研究》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并从该书所倡导的“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的三个方面对这段学术因缘做细致的考察，以期窥视郑振铎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并思考输入的新观念方法在现代中国学术语境中的变异以及应用效果。

一 译介

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整理中国旧文学是其宗旨之一，但正如《文学研究会宣言》所言，“中国的文学研究，在此刻正是开端”，“整理旧文学的人也须应用新的方法”^⑧，因此郑振铎主张，在整理中国文学之前，应该先输入一些文学的常识和基本原理。在《小说月报》改版后的第1期“书报介绍”栏目，他就撰文介绍莫尔顿的《文学的近代研究》，认为，此书是作者“最好的著作”，“对于文学的原理与解释，讲得非常详细，于文学的进化，与文学的批评主义，尤有许多独创之见，裨益于文学研究者不少”^⑨。可见，他对此书评价甚高。他完整罗列了书的目次，并在文末特意指出，自己正在从事此书的翻译，不

久由共学社出版。

1921年8月,《小说月报》第12卷第8期公示了《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列入的第一本书就是莫尔顿的《文学的近代研究》,注明的翻译者正是郑振铎。只是后来他因该书繁重中止了计划。1921年10月,在给《文学旬刊》读者孙祖基的回信中,他说道:“我们现在的责任……乃在极力介绍这样正确的文学原理。以前文学研究会出丛书时,我们即已顾虑到这一层了。所以把 Hunt 的《文学批评原理》, Moulton 的《文学的近代研究》等书都列了进去。但这种书的篇幅似乎稍嫌繁重,且出版需时日。现在我们还暂时先出一种‘文学小丛书’,把文学的根本常识,简简单单的介绍给大家。”^⑩从此处以及最终的实际可知,《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中的《文学的近代研究》并未出版。1923年1月,郑振铎在《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中又对此书郑重推介,称它“是一部研究文学的人必须读的书”,并简述要点及其在文学研究界的反响:“莫尔顿极力主张文学是一体的,应该为世界的研究,不应该囿于分国的研究;又极力提倡研究文学应该注重于归纳的观察与进化的观念。自此书出版后,影响颇大,一九一五年以后出版的文学书,都常常称引他的话。”^⑪

郑振铎因忙于著书、编辑刊物以及搜集中国文学材料,无暇顾及《文学的近代研究》的翻译,后由翻译家傅东华进行。1925年,傅东华撰写的《〈文学之近代研究〉译序》发表于《文学周报》第210期。他在文末指出,译稿第1卷由郑振铎转托商务印书馆出版。不过,笔者查阅有关资料,此译稿并未正式出版,而是刊登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1926年1月,《小说月报》第17卷第1期发布《内容预告》,第一条是:“莫尔顿(R. G. Moulton)的《文学之近代研究》是一部大家都认为以科学方法研究文学的最重要的书,现已由傅东华君译出,将逐期在本报发表。”^⑫傅东华翻译的《导言》和第1、2章发表在当期,随后第3、4、5章先后发表在《小说月报》第17卷第3、5、8期。之后,译稿没有连载。次年,傅东华翻译的“莫尔顿(R. G. Moulton)著《文学进化论》”先后刊登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2、4、6、8期。其实,这里的《文学进化论》并不是另

一本书,而是《文学的近代研究》的第3卷,傅东华翻译发表的是第6、7章。之后,未见再有发表。1927年3月,他又把《〈文学之近代研究〉原序》发表在《文学周报》第264期。第二次译稿发表时,书名由《文学之近代研究》(傅东华译名)改为《文学进化论》,或许暗示着傅东华也曾有将第3卷《文学进化论》单独出版的计划。可惜,他最终不仅没有完成全书的翻译,连第3卷《文学进化论》(共4章)的翻译也没有完成。在《译序》中,傅东华认为,中国文学研究有三种病症,即古文家、道学家、小学家的方法,而莫尔顿《文学的近代研究》“对于这些大小病症都有相当的脉象和处方”^⑬。这是傅东华明知外国文学理论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本土仍坚持翻译莫尔顿著作的原因。

虽然郑振铎并未进行《文学的近代研究》的翻译,但他必定阅读了此书,且对其中所倡导的文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谙熟于心,并将之借鉴到自身文学研究的知识建构中。本文开头已经提到,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中,他把莫尔顿此书中的三个主要观念“文学统一的观察”、“归纳的研究”和“文学进化的观念”,作为整理中国文学必须具有的“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这三个方面是莫尔顿《文学的近代研究》之《导言》陈述的主要思想,也是统摄全书的核心观念和方法。1926年,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强调,中国文学是“未经垦殖的大荒原”,大有可为,但须具备研究的新观念与新途径,新观念是“归纳的考察”和“进化的观念”,新途径之一是“中国文学的外化考”。很显然,这两种新观念源自莫尔顿《文学的近代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化考”是“文学的统一观”观照的结果。可以说,郑振铎把莫尔顿的三个观念当作中国文学研究的“金科玉律”。接下来,就从这三个方面依次讨论莫尔顿所倡导的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如何参与郑振铎的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和实践^⑭。

二 文学的统一观:世界文学视野

1922年8月,郑振铎发表《文学的统一观》一文。他认为,文学研究不能是“局部的人的,时的,地的,种类的研究”,而应该是“统一的全

体的研究”。之所以如此，其一，文学本身是一个整体，“如讲文学的进化，如非综合世界全体的文学界的进化的历程，又怎么会明白文学的进化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其二，各国文学之间相互影响，如若不进行文学的统一研究，“对于文学是很难得真确的完全的知识的”，“于局部的研究也不能有十分精确与完备的见解”。他的文学统一观来自莫尔顿，文末有附记：“文中有许多议论从 Moulton 的 ‘World Literature’ 里得来的，应该十分的感谢他。”^⑤莫尔顿的文学统一观在《文学的近代研究》中又有所发挥和延伸，不仅在第五章“文学的统一与世界文学观”中详加解说，而且全书以世界文学观念为着眼点，考察文学的原理与文体的进化。

其实，一年多之前，郑振铎在《文艺论丛》中就说道：“文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文学的统一——综合——的研究，却没有什么人从事过。我们只看见有什么《法国文学史》《英国文学史》等等，却没有看见过有所谓‘世界文学’的。”^⑥对于如何研究介绍世界文学，他曾编写过《俄国文学史略》，但很快放弃这种国别文学史的计划，认为其不妥当，“因为文学原是一个统一体，分开来研究，只能得到关于某一国的文学的概况，至于全部的文学的发展，却仍不能十分明白”^⑦，因此中国读者迫切需要一本中文版的世界文学史。他本计划和友人一起翻译 John Drinkwater 的 *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但此书以欧洲文学为中心，中国文学和东方文学极其简略，故决定参考此书独立撰写一部《文学大纲》。自 1924 年 1 月始，《文学大纲》在《小说月报》连载 3 年多，后分 4 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文学大纲》中，中国文学部分约 20 万字，占全书 1/4。与当时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以及其它中国文学研究相比，此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世界文学眼光，即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体系中观察。比如，作者指出：“唐人传奇在中国文学上便成了文坛的最初资料之一种，便有了与荷马史诗，《亚述王故事》以及《尼拔龙琪故事》在欧洲文学上的同样位置了。”^⑧这样的世界文学视野通过中外文学的比较与参照，不仅明确了中国文学所独有的特质和具体性，而且能够显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之位置以及中国文学和其他国别文学所具有的共同的人类精神。后者正是郑振铎提

倡文学的统一及世界文学观念的深意所在。

对于郑振铎而言，文学的统一观不仅影响在世界文学观念参照下审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之位置，而且启发了一个具体的研究课题——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研究。1927 年，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认为，研究中国文学的第一个新途径就是“中国文学的外化考”，即“研究中国文学究竟在历代以来受到外来的影响有多少，或其影响是如何样子。这种研究是向来没有人着手过，甚至于没有人注意过的”^⑨。1933 年，郑振铎又在《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中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指出“康庄大道”——寻找新的题材和新的方法。“新题材”之一就是“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的影响”，如“六朝音韵学者所受到梵音的影响，六朝及唐代故事所受到的印度故事的影响，宋、元戏曲所受到的外来的影响”^⑩。这种探究中国文学外来影响的观念贯穿于他先后 3 次编辑的期刊专号《中国文学研究》中。

1923 年，《小说月报》专号《中国文学研究》的《征文启事》指出，专号注重“以现代的文学批评的眼光，来重新估定中国古文学的价值”^⑪。在编者郑振铎看来，世界文学视野就是“一种新的眼光与新的文法”，具体而言，就是从外部观察中国文学，注意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他的这一思路延续到《文学》专号（1934）和《文艺复兴》专号（1948、1949）中。1948 年，郑振铎在《文艺复兴》专号的《题辞》中对自己 3 次编辑《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有过总结。他认为，第一个专号（《小说月报》专号）的两大贡献之一就是“不把中国文学作为孤立的研究，而知道把她放在世界文学的大家族里，开始讨论着她所受到的外来的影响”；第二个专号（《文学》专号）“有好几篇关于中国文学与外来文学关系的文章，已是相当专门性的”；第三个专号（《文艺复兴》专号），“关于梵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血脉相通之处，新近的研究呈现了空前的辉煌”^⑫。可见，注重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研究自始至终是他编辑 3 个《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的重要观念。

在编辑郑振铎的倡导和组织下，3 个《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均有一些文章讨论中外文学之关系。《小说月报》专号有《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许地山）、《歌德与中国文化》（卫礼

贤);《文学》专号有《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霍世休)、《〈沙贡特拉〉和“赵贞女型”的戏剧》(李满桂)、《〈拉马耶那〉与〈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林培志);《文艺复兴》专号有《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季羨林)、《中国文学在德国》(季羨林)、《清中叶中鲜文艺的交流》(王统照)。这些文章题材主要集中在印度文学影响中国文学方面,其中许地山、林培志、李满桂的文章在材料方面得到过郑振铎的直接帮助^②。

在编辑3个《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之外,郑振铎还在自身的文学研究中贯彻探讨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这一学术观念。他认为,中国文学有两次大的外来影响:魏晋时期的印度佛教文学和近代的欧美文学。韵散结合的变文,源自印度的佛经故事,而变文是后来诸宫调、宝卷、弹词等文体的渊源,这一印度影响中国俗文学的研究思路不仅贯穿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而且也体现在《从变文到弹词》《宋金元诸宫调考》等文中。不仅从文体,他还从思想、题材方面论述中国文学受到的印度文学影响^③。对于欧美文学的影响,他计划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④可惜并未撰写,未留下具体的论述。此外,他还在《元明之际文坛概观》中论述波斯及西域文化对元代文学的影响。

受莫尔顿的文学统一观之启示,郑振铎意识到,文学研究应超越国别、语言与时代,以整体的世界文学为对象,故而编写《文学大纲》,并把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研究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路径。不过,正如他所说,中国文学是“未经垦殖的大荒原”,诗经、乐府、戏曲等研究都是“一生的工作”,统一的整体研究实难进行,必须进行分类的专门研究,因此“最好是先有局部的研究,然后再进而为全体的研究,才能精密而详确”^⑤。这就出现一种文学统一研究之背反现象——分类的专门研究。其实,在近现代学术日益精细的驱动下,专门研究是不可避免的学术趋势。郑振铎不可能罔顾这一学术趋势,故统一研究与专门研究基本上共存于其文学研究观念中,而且后者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郑振铎由倡导文学的统一研究逐渐转变为注重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研究的缘故。

三 归纳的观察:“拿证据来!”

归纳法是近代思想的主要特质之一。莫尔顿在《文学的近代研究》中认为,归纳的观察理应用于文学研究,因为“文学问题是用证据来解决的问题”,“如果规避了诉诸素材证明的理论,那么便不能不被怀疑”^⑥。他广泛应用归纳的观察,列举有关材料文献实证自己的观点,比如举例希腊悲剧包含抒情诗和史诗元素、《圣经》预言诗掺和戏剧、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创作混合史诗与戏剧,证明文体元素之间的交互混杂。

郑振铎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等文中把莫尔顿提倡的归纳的观察看作研究中国文学的主要观念之一。他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仅仅是随意的鉴赏,而文学的现代研究是一种科学,是“把文学当做一株树,一块矿石一样的研究的资料”,归纳的观察就是实现文学之科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那么,归纳的观察如何应用于文学研究?他给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拿证据来!”^⑦证据就是材料。即是说,对于某个具体的文学问题,尽可能地把材料搜罗完备,甄别这些材料可靠与否,然后根据可靠的材料分析归纳,得出结论,用一个较为简单的词汇概括之,就是实证。

郑振铎之所以如此强调归纳法,是与他提倡打破传统的文学观念有关系的。他一贯认为,新文学观建设之前提,必须打破传统的固有的文学观念,“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⑧。而传统的文学观可分为两大派:“传道”派、“娱乐”派,前者尤其根深蒂固,把《诗经》解说成美刺主义,把《红楼梦》附会成映射某人某事的政治小说。归纳的考察之意义就在于,抱着怀疑的态度,不相信前人一切的准则与结论,搜罗证据,得出定论,扫除种种陈规陋见,使传统文学显出真面目。

我们以郑振铎的《诗经》研究为例说明其归纳法之运用。《诗经》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一部诗歌总集。然而,经过历代的注疏,《诗经》的解释充斥着曲说附会。郑振铎提出:“我们要研究《诗经》,便非先使这一切压盖在《诗经》上面的重重

叠叠的注释的瓦砾，爬扫开来，而另起炉灶不可。”^③他从最重要的《毛诗序》入手。他认为，《毛诗序》穿凿不通，最根本的原因是其美刺无标准。他罗列3组诗歌证据，同一组诗歌中，诗句类型相同或相似，而《诗序》解释的美刺之义歧义很大。最后，他归纳总结道：《诗序》，“他的美刺，又是自相矛盾的”，“是没有根据，是后汉的人杂采经传，以附会《诗》文的”^④。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之“诗经与楚辞”章中，他还打破前人风、雅、颂之迷误，特别是孔颖达、朱熹、梁启超观念之矛盾，分析大部分作品，把《诗经》重新分为3类：诗人的创作、民间歌谣、贵族乐歌。通过归纳的考察，结果正如他所说，“放开了旧说，而在现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诗的自身，找出他们的真实的性质与本相来！”^⑤不过，郑振铎研究《诗经》，并不是抛开一切古人的成果，完全另立新说，而只是不轻信古人的见解，在充分证据的基础上才下结论。其实，他很尊重古人的研究成果。他撰有《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一文，分注释及见解、音韵名物及异文校勘、辑佚、其他四类，介绍了关于《诗经》研究的200余种书籍，不仅涉及作者、版本，而且还有提纲挈领的评述，“如将这些综述合而观之，可视为相当齐全的一篇《诗经》研究的简史”^⑥。

郑振铎把“拿证据来”的归纳的考察看作文学研究科学化的途径之一，这决定着他的治学方法注重新材料的发现，偏于辑佚与考证。他进入某一研究课题之前，尽可能地把材料搜集完备，再撰写年表、提要、题跋，考证作者、版本，撰写史著等。关于小说，自1926年始，他编辑出版《中国短篇小说集》三集四册，收录自唐至清124篇，被鲁迅评道：“埽荡烟埃，斥伪返本，积年堙郁，一旦霍然。”^⑦同时，他还先后撰写《中国小说提要》《明清二代的评话集》二长文，评述作者、版本、回目及故事来源等。他搜集的单本长篇小说数目也极多，如《水浒传》版本有22种之多。在此基础上，他才撰写《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宋元明小说的演进》《水浒传的演化》等文。关于戏曲，只清代戏剧，他就搜集260本，影印了《清人杂剧》一二三集。他还多年辑编《元明杂剧辑逸》。此后，他再撰写《中国戏曲的选本》《元曲叙录》《元代的杂剧》《元明以来女

曲家考略》等文。此外，他特别重视变文、宝卷、弹词、诸宫调等俗文学，搜罗大量材料，发掘其价值，撰写《宋金元诸宫调考》《佛曲俗文与变文》《佛曲叙录》等文。这些文章结论之所以有所见解，与前人不同，源于丰富的证据（材料）。此外，他还有诸多未实现的搜罗编辑文献的学术计划，比如《敦煌的俗文学》（三集：俗文、变文、小说杂曲）、《中国文艺批评资料》、《中国戏曲总录》、“中国诗人丛书”以及《中国文学名著叙录》等。

郑振铎信服归纳的考察，重视发现的新材料，自然将之用于文学史撰写中，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不少内容都是材料的罗列与铺陈。他在前书《例言》中说道：“本书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的；像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等皆是。”^⑧他突破前人文学史只含诗、词、文的旧说，以及同时代人文学史忽视俗文学的偏狭，使这些其他文学史著作未叙述的内容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无疑丰富完整了中国文学史的景观。只是郑振铎有时过于珍爱发现的新材料，花费篇幅过多，正如书评作者吴世昌所言，“凡郑先生所喜欢的东西，则虽并不必要，也不惜反覆申述，至再至三”^⑨，如《西厢记》的本事，前后叙述3次，叙述《全相平话》的故事内容，竟然占了18页。

郑振铎把胡适《〈红楼梦〉考证》看作是归纳法运用得最好的案例。胡适此文虽然充斥庞杂的材料，但思路极其清晰，其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式是：先排列材料证据，然后甄别分析，最后归纳总结。文中多次出现这样承上启下的语句：“以上关于曹寅的事实，总结起来，可以得几个结论。”^⑩简言之，归纳的观察用于文学研究，论述方式就是“材料—结论”的实证模式，讲究“无征不信”“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不过，莫尔顿并没有把归纳法看作是近代思想方法的全部，只是认为演绎法的法则最终需要归纳法的论证。而郑振铎一心破除传统的鉴赏批评和因袭的文学观念，在输入莫尔顿的“归纳的观察”时，遗落了之外的“演绎”。

四 进化的观念：“有机体”

除了归纳的考察，进化的观念是莫尔顿《文学的近代研究》中的另一重要观念。他在此书第3卷首先分析文体的整体进化，认为文体的原始元素是谣舞，包括语词、动作、音乐三种成分，是一切文体的起源，后来分别发展为诗歌范畴的史诗、戏剧、抒情诗，以及散文范畴的历史、演说、哲学。接下来，在第7、8、9章中，他分别论述史诗、戏剧、抒情诗的进化史。

和归纳的观察一样，郑振铎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等文中把进化的观念看作中国文学研究科学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莫尔顿文学进化论对他有很大影响。1958年10月8日，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术批判会”上，郑振铎承认，著作“有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受英国人莫尔干（Morgan）的‘文学进化论’的影响”^③。他研究中国文学变迁时，注重从文体入手。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例言》中，他说道：“本书的论述着重于每一个文学运动，或每一种文体的兴衰。”^④我们通过章结构的安排，如“律诗的起来”“传奇文的兴起”“词的起来”“变文的出现”“话本的产生”“南杂剧的出现”等，就可知论述思路集中于文体的发展历史。对于文体的进化，韦勒克分为两种：“一个体裁产生出来，有所发展，达到圆熟，继而式微，最终消亡”^⑤，以及一种文体向另一种文体的演化。这两种文体进化的模式都包含在郑振铎的研究实践中。

其一，文体的发展经历由生到灭的兴衰之变。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主要以“词”为中心，把词的历史分为4期：胚胎期、形成期、创作期、模拟期。他在《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中把小说的历史分为5期：胚胎期、发育期、成长期、全盛期、衰落期。可见，郑振铎认为，文体像生物体一样，会有出生、成长、成熟、消亡的进化轨迹。其二，不同文体之间的进化，即一种文体进化为另一种文体。对于变文、弹词、宝卷等诸种俗文学，在《从变文到弹词》、《宋金元诸宫调考》以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他勾勒了清晰的文体进化线索：源于印度的佛经翻译故事进化为初

盛唐时期的变文；变文的体制引入唐宋词与大曲的唱调进化为南宋、金、元时期的诸宫调；变文同时又演变为宝卷与鼓词等。

莫尔顿把进化的观念用于文学研究，除了文体的进化外，还包括“故事”的进化。他把口头的传说材料经过故事混合进化成有机史诗的模式称之为“荷马原则”（Homeric Principle）^⑥。这一点更为郑振铎所认同，被用于考察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他认为，文学“故事”的进化，就是由简单和质朴变为复杂和细腻。他以此研究小说戏曲及民间文学的故事演变，撰写《〈水浒传〉的演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岳传〉的演化》《伍子胥与伍云召》《蝴蝶的文学》等文。比如，对于水浒故事的演进，他详细考证了水浒故事逐渐扩大的过程，从《宣和遗事》的故事概略到元曲的“水浒剧本”，再到罗贯中本的完整故事，最后到包括征辽、征田虎王庆的全本。同时，他也考证了重要版本逐渐演进的过程。再比如，白蛇的故事，他分析，从唐无名氏的《白蛇记》到《西湖佳话》中的《雷峰怪迹》，再到传奇《雷峰塔》和弹词《义妖传》，白蛇由一个害人的妖魔逐渐地演变为有情有义的痴情女郎。

图表作为近代一种科学化的研究方式，被莫尔顿经常应用。郑振铎指出，《文学的近代研究》，“最为特别之点，就是附有许多图表，简明而且重要的图表，使读者比较而观，益易得系统的文学知识”^⑦。全书中，莫尔顿共运用了27张图表，以说明文体六元素的进化、口头文学到固定文学的进化、诗和散文的分化、史诗的进化等重要问题。受莫尔顿的影响，郑振铎也喜欢制作图表以说明文体和“故事”的进化。仅在《〈水浒传〉的演化》一文中，他就用了5个图表，分别说明故事的扩展过程以及版本相互间的关系。

1926年，陆侃如在为游国恩的《楚辞概论》作序时，提到此书的价值之一是“历史的方法”，即“把《楚辞》当作一个有机体，不但研究他本身，还研究他的来源和去路”^⑧。所谓“有机体”，就是把研究对象看作发展演进的，以进化的观念研究它的来龙去脉，因而研究对象不再是静止的某个固定点，而是进化链条上的一个流动点。在郑振铎看来，以进化的观念把中国文学看作“有机体”，从文体和“故事”两个方面研究其发展演

变，是文学之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正如李长之所说，“在寻求演进趋势里看我们中国文学的内容”是“中国文学研究者之路”^④。

五 “理论旅行”

莫尔顿《文学的近代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界影响很大。梁实秋在《近年来中国之文艺批评》中指出，“西洋文学批评杰作之为我国人士所熟悉者，实在寥寥无几”^⑤，而他列举的国人熟悉的三部著作之一就是《文学的近代研究》。特别是，莫尔顿以进化观念考察文体发展历史的研究模式直接被一些研究者袭用。陈钟凡、郭绍虞分别在《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1922）、《中国文学演化概述》（1926）中根据莫尔顿的“谣舞—诗歌—史诗、戏剧、抒情诗—历史、演说、哲学”之进化线索，考察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在文末，二位作者还引用莫尔顿的文体进化图表。

在莫尔顿《文学的近代研究》对现代中国的影响链条上，郑振铎的推介和借鉴有着重要作用。对他而言，莫尔顿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输入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重要凭借，使之由传统的鉴赏批评走上科学研究的轨道。他对传统的文学研究有过评价：“自《文赋》起，到了最近止，中国文学的研究，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过。”^⑥既然传统的诗文评“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那么需要从国外“输入学理”。而观看当时世界学术态势，归纳与进化是其精华所在。梁启超曾论近代归纳法之意义：“言泰西近世文明进步之原动力者，必推培根，以其创归纳论理学，扫武断之弊，凡论一事，阐一理，必经积累试验然后下断案也。”^⑦韦勒克对文学进化论之地位也有过论说：“五、六十年之前，进化的概念曾在文学史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几乎任何一本英国人或美国人的论及口头文学的著作都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其基础的”^⑧。而反观莫尔顿，“文学理论的核心是将归纳法用于文学研究，对他而言，这大概为真正科学的批评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帮助”^⑨。《文学的近代研究》倡导归纳和进化，实则是顺应当时“科学主义”这一世界学术潮流大势。此外，莫尔顿的方法论具有“范式”意义，易于效仿，正如

当时评论者所言，“莫尔顿指出的路径应该被遵从，不久的将来文学专业学生研究课题的最好选择就是他所标识出来的耕作领域”^⑩。因此可以说，莫尔顿此书进入郑振铎等国内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被吸收借鉴，是在反对传统文学鉴赏方法的驱使下，向提倡科学精神和方法的世界学术潮流的一次靠拢。

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把观念和理论由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的运动称为“理论旅行”，并提醒研究者追问：“它的说服力是有所增强呢，还是有所减弱，以及某一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中的一种理论，在另一历史时期或者境域中是否会变得截然不同。”^⑪当我们审视本文中的“理论旅行”时发现，莫尔顿的文学研究观念和办法“旅行”到现代中国学术语境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其“说服力”是减弱的。

第一，莫尔顿的文学统一观是从一个特定观察点出发观察世界文学，因此世界文学因观察点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目。比如，“世界文学对于英国人和日本人而言是不同的：莎士比亚在英国人心中十分重要，在日本人心中却分量微弱”^⑫。郑振铎认为，莫尔顿的统一观如风景图一样，“把一个极大的山峰，只画成一点，把一个极大的湖水，只画成一线”^⑬，是不彻底的，应当以人类为观察的出发点。莫尔顿的世界文学是以欧洲文学为中心，欧洲文学的来源是希腊、希伯来两大传统，研究欧洲各国别文学时自然不可能不以统一的眼光视之。而中国文学则不同，有着较为独立的发展历史，虽然其中有印度文化的输入，但其并不是源头之一。郑振铎的研究难免过度强调了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⑭。

第二，郑振铎对莫尔顿文学归纳法的接受存在错位。郑振铎治学方法包括版本、目录、辑佚、考证等，研究内容偏于考证作者、版本、成书年代、故事来源等。针对他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张荫麟曾指出：“郑君所谓文学研究，实即文学史之研究。夫文学之研究而仅限于史的方面，亦已狭矣。”^⑮然而，莫尔顿把文学研究分为“文学外部的研究”和“文学内部的研究”。他认为，文学家传记、文字、训诂、文学的历史、作品来源等研究都是“外部的研究”，容易使文学研究混同于传记、语言、历史研究，而“内部的研

究”应该是文学家人格、作品整体诠释、文学进化、文学结构等研究。可以说，郑振铎偏重的“文学外部的研究”是莫尔顿排斥的，莫尔顿强调的“文学内部的研究”是郑振铎忽视的。文学到底是人类精神的产物，这就决定着不可能只把它当做“一株树，一块石头”那样纯粹客观存在的事物进行研究。作者、版本、年代、故事来源等事实层面固然需要实证，但文学本身的思想意蕴、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等层面就需要进行审美分析。

第三，国内研究者对莫尔顿文学进化论的应用胶柱鼓瑟。莫尔顿用进化的观念，主要考察文体由同趋异以及由异趋同的过程，以及“故事”由简单趋于复杂的程式^⑤。由于进化的观念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源远流长，莫尔顿并没有把生物进化论机械地套之于文学研究。国内研究者则不然。张荫麟对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批评道：“根据摩尔顿（Moulton）《文学之近代研究》一书中之文学演进表而立论”，“郭君步趋不离，亦可谓食西不化者矣”^⑥。莫尔顿之 Epic Poetry 是指史诗，但史诗在中国文学中基本上不存在，故郑振铎、傅东华、郭绍虞不得不以叙事诗代替之。郑振铎把文体看作生物体一样，经历由生到死的过程，有简单化倾向。其实文体的演变要比生物体的进化更为复杂、曲折，鲜有如此清晰划一的轨迹，正如韦勒克所质疑的那样：“并不存在同生物学上的物种相当的文学类型，而进化论正是以物种为其基础的。文学中并不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生长和退化这些现象，不存在着从一个类型到另一个类型的转变。在类型之间也不存在生存竞争。”^⑦

郑振铎输入莫尔顿《文学的近代研究》的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科学化、完成现代转型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跨文化语境，其“说服力”是减弱的。因此，在肯定郑振铎贡献的同时，也需看到，他在努力融入世界学术潮流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构建文学研究“科学主义”背后，轻视了传统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研究中审美、情感等非实证因素的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生和演进研究（1920—1960）”（编号：16CZW004）的阶段性成果]

会科学院编：《学术动态》第279期，转引自陈平原：《小引》，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莫尔顿（Richard Green Moulton，1849—1924），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戏剧艺术家莎士比亚》（*Shakespeare as a Dramatic Artist*，1885）、《古代经典戏剧》（*The Ancient Classical Drama*，1890）、《圣经的文学研究》（*The Literary Study of Bible*，1896）、《圣经文学纲要》（*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Bible*，1901）、《戏剧思想家莎士比亚》（*Shakespeare as a Dramatic Thinker*，1907）、《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1911）、《文学的近代研究》（*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1915）等。莫尔顿的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傅东华翻译为《文学之近代研究》，本文为统一计，采用郑振铎译名《文学的近代研究》。

③⑥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51期，1922年10月1日。

④如杨义、邵宁宁：《献身中国文艺复兴的卓越先驱——郑振铎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董乃斌：《论郑振铎的文学史研究之路》，《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范宁：《郑振铎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杰出贡献》，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第354—3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福康：《郑振铎论》（修订版），第168、169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部铁军：《郑振铎与外国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85页，吉林大学文学院，2013年。

⑤胡适称“输入学理”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参见《新思潮的意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5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⑥郑振铎：《答孙祖基》，《郑振铎全集》第16卷，第485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又，整理者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中还把莫尔顿的英文名误写为“B·G·Nowlton”，正确书写应为“R. G. Moulton”。参见《郑振铎全集》第6卷，第8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⑦②③陈福康：《郑振铎论》（修订版），第169页，第664、665页，第578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⑧《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1921年1月10日。

⑨④郑振铎：《莫尔顿的〈文学的近代研究〉》，《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1921年1月10日。

⑩郑振铎：《答孙祖基》，《文学旬刊》第19期，1921年11月2日。

⑪郑振铎：《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小说月报》第14卷第1期，1923年1月10日。

⑫《第十七卷〈小说月报〉内容预告》，《小说月报》第

①王瑶：《王瑶教授谈发展学术的两个问题》，原载中国社

- 17 卷第 1 期, 1926 年 1 月 10 日。
- ⑬傅东华:《〈文学之近代研究〉译序》,《文学周报》第 210 期, 1926 年 1 月 31 日。
- ⑭由于新中国成立后, 郑振铎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 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对早年的学术研究观念和方法进行反思和批判, 故本文的论述集中在研究对象的民国时期, 特别是中国文学研究转型的 20 世纪 20 年代。
- ⑮⑯郑振铎:《文学的统一观》,《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8 号, 1922 年 8 月 10 日。
- ⑰郑振铎:《文艺丛谈(四)》,《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1 期, 1921 年 1 月 10 日。
- ⑱郑振铎:《叙言》,《文学大纲》,《小说月报》第 15 卷第 1 期, 1924 年 1 月 10 日。《文学大纲》出版时, 郑振铎未采用此篇《叙言》, 而是重写。
- ⑲郑振铎:《文学大纲》(二),《郑振铎全集》第 11 卷, 第 115 页,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 ⑳㉑㉒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小说月报》第 17 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 1927 年 6 月。
- ㉓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文学》第 2 卷第 6 期《中国文学研究》, 1934 年 6 月 1 日。
- ㉔《〈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号征文启事》,《民国日报·觉悟》1923 年 10 月 28 日。
- ㉕郑振铎:《题辞》,《文艺复兴》专号《中国文学研究号(上)》, 1948 年 9 月 10 日。
- ㉖三篇文章末尾都感谢了郑振铎, 李满桂甚至说:“本文的参考书, 多是郑振铎先生所介绍, 编者只作一番整理功夫。”
- ㉗1931 年,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现代中国史丛书”选目预告有郑振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见《文艺新闻》第 15 期, 1931 年 6 月 22 日。
- ㉘④① Richard Green Moulton,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5, p. 6, p. 132.
- ㉙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小说月报》第 14 卷第 1 期, 1923 年 1 月 10 日。
- ㉚⑩郑振铎:《读〈毛诗序〉》,《小说月报》第 14 卷第 1 期, 1923 年 1 月 10 日。
- ㉛⑳㉑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 第 41 页, 第 4 页, 第 5 页, 岳麓书社 2013 年版。
- ㉜鲁迅:《〈唐宋传奇集〉序例》,《鲁迅全集》第 10 卷, 第 87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㉝吴世昌:《评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三、四各册》, 吴世昌著、吴金华编:《吴世昌全集》第 2 册, 第 60 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 ㉞胡适:《〈红楼梦〉考证》, 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下)》, 第 790 页, 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 ㉟郑振铎:《最后一次讲话》,《郑振铎全集》第 3 卷, 第 379 页,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因为文稿是郑振铎的发言摘录, 此处有误, 应为“美国人莫尔顿(Moulton)”。
- ④① [美] 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 4 卷, 杨自伍译, 第 94 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
- ④②陆侃如:《序》, 游国恩:《楚辞概论》, 第 2 页, 述学社 1926 年版。
- ④③李长之:《论研究中国文学者之路》,《李长之文集》第 3 卷, 第 111 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 ④④梁实秋:《近年来中国之文艺批评》,《东方杂志》第 24 卷第 23 期, 1927 年 12 月 10 日。
- ④⑤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第 113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 ④⑥⑧ [美] 韦勒克:《文学史上进化的概念》,《批评的诸种概念》, 丁泓等译, 第 44、49 页, 第 57 页,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 ④⑨ Eugene Williamson, “R. G. Moulton and Modern Criticism”, *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vol. 70, no. 4 (1971), p. 633.
- ④⑩ J. G. Robertson,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by Richard Green Moulton”,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12, no. 1 (1917), p. 121.
- ④⑪ [美]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 李自修译, 第 400 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
- ④⑫ Richard Green Moulton, *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Place General Culture*,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11, p. 6.
- ④⑬郑振铎在《最后一次讲话》(1958) 中承认了此点, 参见《郑振铎全集》第 3 卷, 第 379、380 页,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陈福康也认为, 此点是《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不足之处, 参见《郑振铎论》(修订版), 第 672、673 页,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 ④⑭⑮张荫麟:《续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国闻周报》第 5 卷第 17 期, 1928 年 5 月 6 日。
- ④⑯莫尔顿把“故事”进化的程式分为 6 种, 分别是凝聚式、包络式、卷绕式、枝叶延展式、并列式、多重统一式。参见 Richard Green Moulton,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5, pp. 144 - 152.

[作者单位: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 马勤勤